

◆ 付建舟 著



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



付建舟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 / 付建舟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506-0633-3

I. ①近… II. ①付… III. ①中国文学: 近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2727号

- 书 名 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
著 者 付建舟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212404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49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633-3
定 价 46.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7871135)

序

关爱和

花费多年工夫,付建舟的《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即将出版。建舟在河南大学读博士期间,我忝列导师之列。他请我为他的书稿写篇序,我欣然同意。做学问有多种路径和方法,建舟写作此书,能根据发现的一批文学史新材料,经过分析概括,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做到新材料与新观点的有机融合。它标志着建舟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这是一部框架宏阔、论据扎实、注重建构的论著。该著立意高远,具有明确的学术追求,意在打破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学科藩篱,提出自己独特见解,可谓一家之言。该著提出的“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概念,不同于“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概念,别具新意,有很强的前沿性。建舟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一定的才学、一定的胆识,也具有学术创新的自由独立精神,初步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该著的特色大略有以下几点:

注重文献资料,以此作为论述的基础。建舟心无旁逸,潜心学问。他治学态度严谨,注重文献考辑。最初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出版的《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尽管是文学思潮研究,却表现出注重文献资料的态势。近十几年来,他阅读了数千部清末民初时期出版的文学作品、数百种旧期刊,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并开始编纂很有文献价值的著作,如已经出版的《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即将出版的《近代上海报人小说版本经眼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部分成果)、《〈说部丛书〉叙录》(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

金项目的部分成果)以及其他计划中的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项目。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物质利益极具诱惑的今天,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如此潜心治学,确实难能可贵。该著不是文献学著作,重点不在于文献的注释、校勘、辨伪,但重视文献资料,注重实证性研究,使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避免空疏的结论。

力图学术建构,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建舟学术眼光敏锐,他不是为了资料而资料,而是从文献资料出发,或者说从文学史的史料出发,展开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他巧妙地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把从《申报》创刊的1872年至“左联”成立的1930年间的中国文学界定为“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同时,还把“近现代转型期”区分为“核心时段”与“一般时段”,其中甲午战败的1895年至《小说月报》革新的1921年间为核心时段,其余时段为一般时段。核心时段突出“转型”,一般时段强调转型的“源”与“流”,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整体性。这种文学史分期妥当与否,当然可以讨论,但对于打破学科藩篱,淡化乃至消除新文学本位观所造成的偏至,对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紧密联系的部分进行整体观照,具有重要的意义。“转型”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突出特点,文学的哪些方面转型,如何转型,转型的来龙去脉等等问题均需要认真研究,本论著试图从创作主体、文学运动、文学观念、文学类型、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传播等方面全方位整体把握,突出“新变”。在研究过程中,建舟从这一时期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努力进行“现象还原”,设身处地仔细揣摩历史情景与文学现象,从大量的文学史料中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全书七章,几乎每章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内容。例如第三章“文学观念论”中关于“中国现代纯文学观的确立”问题,他通过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纯文学观正式确立的时间不是在五四时期,而是三十年代初,立论新颖,有凭有据。关于文学的“功利”与“审美”问题,他提出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呈现出“功利”与“审美”的双重变奏,这对只注重以“启蒙”为主潮的功利文

学观有纠偏的意义。又如,第六章“文学翻译论”,他把晚清的“意译”与五四以降的“直译”、晚清的“译文中心论”与五四以降的“原文中心论”等量齐观,由此做出自己的评价,使晚清的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免遭不应有的贬抑。他还用“日语文学”一词替代“日本文学”一词,把根据日译本翻译的非日本文学汉译本与日本文学汉译本作为一个整体,考察转型期这些“日语文学”汉译本与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的密切关系,这更符合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东洋渠道的译介对中国文学转型影响的实际状况。

追求学术研究的当代意义。近现代文学研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追求纯学术,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自娱自乐,也可以拥有人间关怀,关注现实。建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相反,他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便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益于世。其论著开篇就说,20、21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找回那份自信。文化建设方面的“新国学”应运而生,“孔子学院”全球遍地开花,来华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急速上升,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全球不断推广,这与五四文化先驱者“全盘西化”,甚至试图废除汉字而采用拉丁文的激进主张可谓背道而驰。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从汉语到中国文化,不断深入。世界由一超独霸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全球视野,用历史眼光,凭当代意识,重新审视 19、20 世纪之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全面转型,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势在必行。作为文学研究者,重新审视 19、20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其意义自不待言。在论者看来,他研究“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并非不关注现实,而是更好地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建舟任职的浙江师范大学,是一所有着良好学风和学术氛围的学校。相信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建舟会有更多的论著问世。

目 录

序.....	关爱和(1)
绪 论 “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导论	(1)
第一章 创作主体论	(17)
第一节 主体要素变迁论	(17)
第二节 主体角色转换论	(33)
第二章 文学运动论	(51)
第一节 从革新到革命:转型期的文学运动	(51)
第二节 工具论与目的论:转型期的白话文运动.....	(92)
第三章 文学观念论	(109)
第一节 从传统到现代: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	(109)
第二节 中国现代“纯文学观”的发生	(123)
第三节 “功利”与“审美”文学观的双重变奏	(142)
第四章 文学类型论	(165)
第一节 小说类型论	(165)
第二节 散文类型论	(177)
第三节 戏剧类型论	(190)
第五章 文学创作论	(210)
第一节 转型期的狭邪小说论	(210)
第二节 转型期的政治小说论	(229)
第三节 转型期的社会小说论	(246)

第四节 转型期的历史小说论	(266)
第五节 转型期的言情小说论	(278)
第六节 转型期的公案与侦探小说论	(288)
第六章 文学翻译论	(302)
第一节 “意译”与“直译”:转型期的文学翻译	(302)
第二节 “译文中心”与“原文中心”:转型期的翻译文学	(321)
第三节 日语文学的汉译与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 ...	(338)
第七章 文学传播论	(360)
第一节 报刊图书媒介与转型期的文学传播	(360)
第二节 文学广告与转型期文学史的建构	(380)
参考文献	(397)
后 记	(405)

绪 论 “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导论

世界文明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经过若干年之后运行到西方,新千年伊始,再次向东方运行。20、21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找回那份自信。文化建设方面的“新国学”应运而生,“孔子学院”全球遍地开花,来华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急遽增加。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全球不断推广,这与五四文化先驱者“全盘西化”,甚至试图废除汉字而采用拉丁文的激进主张可谓背道而驰。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从汉语到中国文化,不断深入。

21 世纪伊始,西方发达国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肇始,西方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盟、日本等,风光不再,整体经济下滑趋势严重。同时,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四大新型经济体有两个在亚洲。独霸世界的美国,试图在全球推广美国模式,却因文明的冲突、经济的衰退而遇阻,不得不重新进行全球布局,重返亚洲,声称“亚洲,我回来了”。原有的世界格局开始剧变,由一超独霸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机遇就是挑战,把握时机就能后来居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全球视野,用历史眼光,凭当代意识,重新审视 19、20 世纪之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全面转型,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势在必行。作为文学研究者,重新审视 19、20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其意义不言自明,因为两次世纪之交中国的全面转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前一次转型对后一次转型具有极好的借鉴作用,这也是

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吸引人的巨大魅力所在。

文学史分期一般是从某一视角对文学史的认识,视角不同,分期也不同。任何文学史分期都有其合理性,也存在局限性,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分期也不例外。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样的分期主要是以中国历史的性质为依据,它使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两个比较稳定的二级学科。然而,把一百五十多年的中国文学人为割裂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大块,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由于文学史研究视角的变化,传统的文学史分期面临挑战,有的新主张如现代文学史起点“前移”论也存在一些争议。笔者试图超越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学科疆界,采用“转型”视角,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提出“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以便既突出转型,又强调源流,更注重整体性。

现代文学史起点“前移”论

面对传统文学史分期的局限,一些学者早就寻求突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酝酿已久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横空出世,石破天惊,赞誉之声压倒贬抑之声,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而持续的影响。时代的步伐已经迈入 21 世纪,20 世纪已成历史。也许时过境迁,也许难以获得新的学术突破,也许研究兴趣或侧重点的转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样的远近背景下,现代文学研究者,如严家炎、范伯群、孔范今、黄修己、汤哲声、栾梅健、王风等人,或者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出发,或者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出发,把近代文学的一部分纳入研究视野,大有挤压近代文学研究空间以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空间之势。

有的学者把现代文学的源起或起点追溯到 1898 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就发其端,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的孔范今、主编《20 世纪中国文学史》

(1998)的黄修己等人殿其后。有的学者追溯到1892年,如严家炎、范伯群、汤哲声、栾梅健等。严家炎与栾梅健比较温和,使用温和性的“起源”、“源头”等词,避免激烈的争论。栾梅健认为《海上花列传》出版的1892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①。严家炎认为五四文学思潮的“源头”可上溯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此时有三座标志性的界碑。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出“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倡导以口头语为基础形成书面语,为白话文开辟了较为宽广的途径。陈季同通过法文著作和中文材料,提出了小说戏剧亦中国文学之正宗,世界文学乃中国文学之参照,倡导大规模的双向翻译等见解主张,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两部有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即陈季同1890年出版的法文《黄衫客传奇》和韩邦庆1892年发表的《海上花列传》^②。他使用“源头”而不使用“起点”,暂时不会对现行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的体制构成根本性颠覆。范伯群与汤哲声比较激进,主张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向前位移”。范伯群发现《海上花列传》有六个“率先”,即率先将镜头对准“现代大都会”,率先突破“才子佳人”模式,率先选择“乡下人进城”视角,率先在文学语言(采用吴语)上大胆革新,率先采用“穿插藏闪”小说结构法,率先采用现代化的发行方式,并以此确认该作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1892年就成为现代通俗文学的起点^③。他还认为:把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遮蔽了五四之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早期小说中引进科学、人权、文明的时序,早期文学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以及早期白话文倡导和早期文学译作等,均显示了若

① 栾梅健《1892: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论〈海上花列传〉的断代价值》,《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② 严家炎《“五四”文学思潮探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4期。

③ 范伯群《〈海上花列传〉: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干现代化的一面,不能被遮蔽。“要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从原始资料的挖掘出发,顺应这一‘向前移’客观路向。”他大体前移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①。汤哲声也认为,“《海上花列传》无论是文学观念、创作观念还是它的生产基础都符合了现代文学的开始”^②。这与范伯群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风思考“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的问题,并撰文指出,处于“资源重组”的古代文学与具有“自足传统”的现代文学之间的近代文学,难以被二者的叙述框架兼容,这既是它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理由,也是它有可能被蚕食甚至肢解的理由。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它所蕴藏的学术潜能“吸引着新的研究力量”^③。他从学科地位、学科特性、学术传统、研究力量以及研究趋势,在多学科对比中论述了近代文学,新的研究力量热情洋溢地高举旗帜向这一蕴藏学术潜能的领域进军。

这些学者从两种视角出发追溯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或“起点”: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视角,1919年(或1917)以前近二十年的文学自然被纳入研究视野;一是单向度的“现代性”视角,在这一视角的研究者看来,“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而是始于晚清文学界革命甚至更早,于是现代文学的“起源”或“起点”就自然前移。不过,这两种研究视角(尤其是后者)的产生存在一个背景,就是现代文学领域的开发已经饱和,这是该领域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近代文学领域的开发还远未饱和,这是该领域遭到“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文学史疆界的坚守与超越

然而,一些近代文学研究者如郭延礼、郭浩帆等极力维护中国

① 范伯群《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② 陈国恩、范伯群等《百年后学科架构的多维思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问题的对话》,《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

③ 王风《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近代文学的学科独立性。郭延礼撰文与范伯群商榷,文中涉及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他指出,“作者以1892年作为现代通俗文学史的起点,不论从文学标准还是历史标准来衡量,都是值得商榷的”。显然,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向前位移”到1892年是他所难以接受的。文中还涉及文学转型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应是一个由新因素萌生、开始转型,以及转型的基本确立几个阶段。这一转型期的全过程,就是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的整个历程。而需要明确的是,转型期的文学既不是古代文学的尾巴,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开端。《海上花》即使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但它本身也不是‘现代’通俗小说,因为整个转型期的文学都属于近代文学的范围”^①。在他看来,现代文学研究者不是不可以去研究近代文学,而是不能试图把近代文学的部分研究空间纳入到现代文学之中去,因为这严重威胁到近代文学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造成严重的学科危机。郭浩帆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十分重视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并注意到近些年学界这样的研究动向,随着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逐渐强化,而近代文学逐渐淡化,“近代文学学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近代文学合法性的质疑,他指出:“近代文学该不该取消,得站在近代文学的本位立场上决定;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何,其参照价值既不应该是古代文学也不应该是现代文学,而应该是近代文学本身。”^②文学史分期常常涉及到近代文学,说明近代文学的意义重大,价值倍增,根本原因是近代文学所处的转型(或者说过渡)地位。谢冕说得很直接,也很到位:“由于近代文学感应了时代的变化,引进和实验了许多适应社会生活变动的因素,在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看来,它不够‘古典’;同

① 郭延礼《雅俗之辨与通俗文学的泛化——评范伯群教授的两部〈通俗文学史〉》,《文艺研究》2008年第11期。

② 郭浩帆《从方法论角度看近代文学的学科建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时,由于那些新旧参半的语言和生硬的新名词概念的充填,在研究现代文学的人看来,他又不够‘现代’。”^①正因为近代文学“不够古典”而长期被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忽视,又正因为它“不够现代”而长期被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忽视。时过境迁,也许正因为近代文学“不够古典”与“不够现代”而一时被学界所关注。“不够古典”与“不够现代”正是近代文学的转型特质,这也正是相邻学科不断“入侵”的原因,也是新的研究力量踏着时代转型的节拍不期而至的原因。因此,近代文学研究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总而言之,五四文学溯源也罢,现代文学起点前移也罢,近代文学史疆界坚守也罢,近代文学(晚清文学与民初文学)处于矛盾的焦点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不同学科为了扩大研究空间的争夺战倒是其次,首要的是研究视角悄然变化,不再是简单的所谓“穿靴”与“戴帽”,而是各自均追寻文学的“源”与“流”。相对于近代文学,作为强势学科,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压倒性优势,各自从其“根据地”出发向近代文学领域大举扩张,压缩近代文学的空间,甚至使近代文学瓦解(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其实,这无可厚非,也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如何处理争夺的领域,即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研究这一时段的文学。

“拓展方”与“坚守方”二者均有其合理性,也存在很大缺陷。一方面,长期以来学界约定俗成的规定,即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存在相对的学科疆界,轻易撼动这一既成的学术基线可能会使现有的学术研究失范;另一方面,不管是现代文学研究者,还是近代文学研究者都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转型问题,这种转型既不是近代文学独立完成的,也不是现代文学独立完成的,而是二者共同承担的。然而,拓展空间者与坚守阵地者主要从各自学科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不是试图超越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笔者认为,必须突破学科藩篱,超越学科疆界,有必要提出“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

^① 谢冕《近代文学浅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6期。

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它既可以避免学科分歧与冲突,又贴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概念及其理论资源

所谓“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是指中国近现代时期(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传统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剧变的进程,一个在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中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思想、文学观念、艺术形式、审美取向、语言模式以及传播方式等全面转型的历史进程,一个文学与外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思潮相互激荡的文学进程。“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不是简单地为了打通“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否则就变成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而是为了把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中紧密联系的部分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而有利于研究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嬗变,严格地说是近现代转型。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在打破长期以来人为地割裂晚清文学、民初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做法。晚清文学、民初文学与五四文学三个概念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够突出各自的特点;然而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即不利于这三部分文学内在联系的探讨,不利于对晚清文学、民初文学与五四文学进行整体观照,更不利于对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考察。

一般说来,中国文学的近现代嬗变,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就已经开始,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还没有完全结束。不过我们重点考察的是中国文学的转型问题,必须突出 1840 至 1949 年这一百多年里文学转型的重要时段,而不是全部时段,这个重要时段就是笔者所谓的“近现代转型期”。在界定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期”之前,有必要阐释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尤其是“中时段”与“短时段”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的论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因为文学史观往往受到历史观的深刻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是 20 世纪国际史学界影响较大的学派之一,该学派反对受实证主义影响的以政治史、外交史为中心的 19 世纪传

统史学,而提出新的史学理论。其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新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历史是由在不同层次以迥然不同的速度同时并进的几个进程组成,这些进程分为三个结构层次。处于最底层的是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如长时期内缓慢变化的人类的地理、海洋和人口环境等。处于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的是社会史,或者说是群体和集团史,这是节奏缓慢的历史,如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史,这些变迁延续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上面的是个体史、事件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种历史本质上是极端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①,如短期内发生的波动沉浮和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布罗代尔还把这三种时间分别称为“长时段”(即“地理时间”)、“中时段”(即“社会时间”)和“短时段”(即“个别时间”)。换句话说,“长时段”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其缓慢的“结构”(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这是在历史上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中时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局势”(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这是影响历史进程的直接原因;“短时段”是指一些突发“事件”(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这些事件只是历史发展中转瞬即逝的浪花与尘埃。

作为历史理论,“时段”理论(尤其是“短时段”与“中时段”理论)应用于文学史研究再恰当不过了。根据“短时段”理论,寻求文学史中的重要分界点,再结合“中时段”理论考察文学变迁或转型的起伏态势,以确定文学周期性变化的起止时间。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鲜明地表现出近现代转型的起伏态势,那么,这种起伏态势源于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8页,载胡戟主编《史学明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何时,又终于何时呢?

“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初步界定

根据布罗代尔的“短时段”与“中时段”理论,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一般对历史进程中的“短时段”起作用,而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的起伏兴衰则在“中时段”中起作用,我们由此结合政治事件、军事事件与文化事件来探讨分界点。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而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比较合理,同时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起点也比较合理,但作为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起点就不合理,因为该年缺乏文化或文学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近三十年过去了,随着殖民者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也日益加强。1872年4月3日,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申报》以期盈利。《申报》的创刊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中国近代报纸开端的标志,是由外国人创办而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对中国文学转型的历史作用是这一时期其他任何文化事件都无法比拟的。《申报》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报纸模式,即包括新闻、言论、文艺和广告四个基本要素。这归功于它的改革:首先,重视言论,强调“国计民生”;其次,注意刊载文艺作品,特辟专栏,开副刊之先声;第三,改革新闻报道,尤其是倾向普通百姓立场的社会新闻。《申报》注重文艺,广征文稿,而投稿十分活跃,以至报纸版面难以容纳,这促使了文艺性月刊《瀛寰琐记》于同年11月11日顺利诞生,并选登了大量来稿^①。1872年《申报》的创刊并非孤立的文化事件,还有不少重要文化事件与之一起形成时代的文化气候。同年2月4日中国第一份政论报纸《循环日报》创刊;同年8月11日,清朝政府首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325—3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